

从埃德蒙·伯克保守主义思想看 “光荣革命”后英国人的国家观 ——兼论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曹瑞臣 [菏泽学院 菏泽 274015]

[摘要] 埃德蒙·伯克是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的开创者,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以《法国革命论》为转折点,掀起改良与革命之争,伯克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流血和激进主义,尊崇传统与秩序,力主改良,反对革命,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对英国及其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变迁影响深远。作为“光荣革命”后那个时代精英分子的杰出代表,其身上所折射出来的保守主义理念,反映了“光荣革命”后英国社会走出了一条非暴力的渐进式改良发展路径,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那个时代及其以后英国人保守的国家观,同时充分展现了英吉利民族政治文化的智慧,至今其保守主义理念仍旧为我们在国家治理、处理传统与变革的关系时提供有益镜鉴。

[关键词] 伯克; 保守主义; 改良与革命; 国家观; 论战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2)06-0093-08

英国“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确立的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捍卫了英国人“古已有之”、源自于自由大宪章(The Magna Carta)的自由传统,奠定了近代英国宪政民主之根基,为人类社会开创了一条非暴力革命的制度变革之路,由此形成了英国社会独特的和平、渐进式改良发展模式,为近代各国社会制度变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思想文化遗产。作为18世纪英国最优秀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其保守主义思想充分反映了“光荣革命”后英国人的思想状态。政治和思想大师伯克(又译名柏克)秉承了英国人重视经验哲学的传统,崇尚实践理性,尊重权威与秩序,珍视自由,看重循序渐进,多温和改良特色,少激进革命色彩,多妥协思维,少暴力倾向,多宽容,少极端,造就了英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理念和处事哲学,因此伯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18世纪英国人独特的国家观,代表作《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成就其一世英名。同情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y)曾这样评价埃德蒙·伯克,他说伯克的思想是永恒的政治智慧宝鉴,没有这一宝鉴,政治家们不过是

在未经测绘的海面上航行的水手,他甚至认为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尚无一人比他更伟大^[1]。

一、稳重守成的保守主义传统与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国家观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伯克堪称18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忠实捍卫者和践行者。作为国会议员,伯克以雄辩、犀利、优雅之文风阐述自由主义观点,伯克博学善辩,力主政治改革,清除社会积弊,其社会改良良好形象使之在下院声誉鹊起。如在北美殖民地问题上,批评国会,同情和支持北美独立,再比如作为爱尔兰人伯克在国会对爱尔兰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改善而进行诸多努力,以及批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横暴统治和种种腐败,改革政府对印度的管理体制等^{[2]189}。若非法国大革命爆发,伯克将会以自由主义思想的标榜形象而流芳百世,不会成为革命激荡年代国家间“改良与革命”之争的掀起者,也不会是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

(一) 英国保守主义传统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英国的保守主义还没有

[收稿日期] 2012-02-23

[作者简介] 曹瑞臣(1976-)男,菏泽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形成理论体系,只是散落于人们的思维习惯、心理态度和生活方式,远未上升到保守主义思想哲学高度。英国作为保守主义的发源地,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譬如从哲学传承上与培根、洛克浓厚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是分不开的。既然谈到保守主义,就有必要弄清这一概念,以便于更好的厘清“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现实。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简单意义上就是保持事物的原貌,保守主义以谨慎和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变革和革新,而对革新的敌视是人类的普遍心态。自由主义源自启蒙运动、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保守主义之所以反对和怀疑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是因为它威胁到了传统的宗教和世俗的权威。保守主义敌视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表达出的自由话语和平等权利,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深深的恐惧^{[3]54-58}。英国知名政治学者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在其专著中谈到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克林顿·罗西特本人对保守主义概念的界定时,罗西特区分了四种类型的保守主义:本质上的保守主义、情景上的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保守主义哲学,罗氏特别强调情景上的保守主义,指的是一种态度,反对可能导致社会、经济、法律、宗教、政治和文化秩序分裂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们表现出希望维持现状的倾向,对激进主义的恐惧就是这种倾向在政治领域的反映^{[4]2}。保守主义有这么几个观念:一是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社会主要依赖传统,传统的价值和制度,因为其中蕴含了内在固有的智慧。二是它信奉不完美哲学,认为人类是不完美的,很少依靠理性,或是内在品德。三是它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不是人类精心而为的,也非理性创造,而是自然存在的。四是它尊崇权威、法律、秩序和领导,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和不平等是自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3]56-58}。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是土地贵族寡头统治的社会,保守主义的思维习惯和态度已经显现,如作为保守的政党托利党领袖和政治家的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在1749年说:“拥有地产的人是我们政治之舟的真正船主,而那些经营货币的人只不过是船上的乘客而已。”^[5]从博林·布鲁克的思想言论中深度折射了英国社会上层人士和统治精英对贵族政治传统的维护,说明传统思维习惯决定其政治上的保守理念。

(二) 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及其国家观

法国大革命起初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一度让英国朝野上下欢呼,因为它体现了英国政治制度的理想。然而在不列颠的政治家中,伯克一改辉格党自由主义捍卫者形象,以笃定的立场、敏锐的预见性洞察

着邻国的这场“洪水猛兽”似的社会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热情尚未冷却,他就估计到法国社会要发生巨变,他对朋友写到:“我看到坐落在我们西方政治制度中心的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度的全部政治的毁灭,不仅对于欧洲,而尤其是对本国有着许多不利。”他相信法国发生了一场可能推翻君主制的革命,但要丧失自由。伯克针锋相对地攻击法国革命破坏着传统的一切,会导致共和国的无政府状态,而恢复它们将会费时良久,法国暴民破坏了社会秩序,威胁着欧洲文明,故英国必须尽快加强防务,以和法国争高低^{[2]196}。随着事态的发展,伯克也从最初欢迎态度逐渐转向抵制与抨击,历几个月的深思,1790年11月1日伯克终于发表《法国革命论》。事实上,该书最初仅是伯克对巴黎一位很年轻的先生的复信,即作者的法国友人杜邦先生,杜邦致信伯克征询他对法国大革命后最近事态的想法,在慎思之后伯克以《兼论伦敦某些团体有关该事件的行动,一封原意系致巴黎一位先生的信》,交付刊印,即为本书^{[6]1-5}。书中提出了习惯与守成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若放弃传统,则会导致社会的整体崩溃。《法国革命论》的问世和辉格党内部福克斯派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分裂,标志着英国保守主义的诞生,伯克由此也自然被后世尊为保守主义大师和开创者。1970年11月6日内该书以每册5先令高价售出7000册,以后屡屡再版,广为流传。乔治三世读了此书,称之为“一本好书,一本特别好的书,每个绅士都应该读它”。到1797年伯克去世时,此书共发行50万册^{[2]196}。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理念和实践冲击会严重危及到不列颠贵族统治的地位,所以社会上层精英以伯克的《法国革命论》的问世为契机迅速达成共识:坚决捍卫传统,坚决抵制法国革命及其影响,必要时武装干涉,由此保守主义的思维与习惯上升为意识形态和信仰。伯克保守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作中,伯克反对理性政治,因为理性是有限和不可靠的,他认为革命政治的致命缺陷是假设对政治制度的变更是以满足抽象理论模式的需要,而法国政局的频繁变更便是不可靠的理性政治的产物,不过伯克也意识到随着环境的变化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和修正。关于法国,伯克预言出现无政府主义和独裁,不久以后便验证了;关于英国,伯克坚决劝告英国人接受英国自身自由的逐步推进;关于全世界,他谴责那种停留在正确与错误的抽象原则上的政治哲学,宣布每个民族形成有赖本国的环境、历史和特点^{[7]308}。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与英国的保守主义传统是相承的,特别是对“光荣革命”的原

则和信念深信不疑,而这正是英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智慧的集中结晶,也是英国人数百年来积淀下的光辉遗产。英国人深知内战的教训,面对克伦威尔之后社会的动荡与无序状态英国政治精英们学会了妥协,丢弃了革命暴力思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充分展示了英国人的妥协思维、务实精神和实用主义风格。当时最优秀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伯克相信这是传统政治智慧下的产物,非暴力的改良和变革思维渗入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而法国大革命表明法国走的是一条与“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不仅迷信革命暴力,而且是对优秀民族传统的彻底背叛。因此伯克是站在英国民族的经验 and 传统上批判法国大革命原则以捍卫英国传统,当然他也无法理解法兰西民族独特的民族传统,甚至更难想象法国大革命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件预示了现代文明时代的来临。英国贵族精英保守的深层原因在于联合发动“光荣革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贵族都认为“光荣革命”已经确立起人类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因此任何变革都只会摧毁这种完美性,导致恶劣后果^[8]。法国大革命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原则正在危及英国传承下来的传统与秩序,而这种传统与秩序根本的是贵族政治下的传统与秩序,因此伯克展开攻击的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本身,他所关心的不只是法国局势,而真正意图在于通过对法国革命的批判来论证英国立足于传统和古老宪法基础上的治国之道和力图避免国内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即将掀起的激进改革运动。

基于“光荣革命”的原则,伯克保守主义的国家观和关于国家的本质的理念是:导致国家行为的政治生活有一个核心,是“宪法”。宪法存在于人们以之行使权力的法规和习俗之中,它指导、限制、认可权力,它据以进行变革和发展是自身的内在逻辑:先例、惯例、以及抽象司法概念的逻辑。同时伯克认为保守主义的天性并不是要阻止变革,因为改良和变革是国家不可少的运动,而是捍卫经历变革保留下来的本质。同样宪法的本质就是要维护社会本质,公民社会一旦遭破坏,就难以恢复。保守主义政治家的任务就是与折磨着国家的传染病作斗争,维护滋养着国家的各种制度。民主这种传染病已四处蔓延,乃至从健康角度看,它可能被误解为高烧不退。托克维尔在论及这一病症时写道:它不但使每一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4]37-38}。托克维尔的表述感情强烈,反映出法国大革命在所有后代的心灵中播下的痛苦,从侧面印证法国大革命在那个充满

理想与激情、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里对人的思想观念、对国家与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某种意义上证明了英国尊重传统下渐进式改革的优越性。

伯克批判法国大革命对人类传统智慧和文明的毁灭,它根本上违反了传统社会所尊重的政治契约和国家观,而伯克认为这种契约的国家观恰是人民应该加以维护的:“社会确实是一种契约。对于那些单纯以偶然的利益为目标的各种附属性的契约,是可以随意解除的,但国家却不可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一些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不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协定,可以由缔结者的心血来潮而加以解除的。我们应当怀着另一种崇敬之情来看待国家的。……它乃是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作关系,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作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的一种合作关系。”“……当法律被破坏,那么自然状态就得不到遵守,反叛就会宣布为不合法,会从理性、秩序、和平、德行和成效的忏悔世界被驱除、放逐到那个疯狂、无序、邪恶、动乱、徒劳无益的忧伤的敌对世界里去。”^{[6]129-130}

二、英国式改良对抗法国式革命

法国人和革命家们按照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理性指导下所设计的国家未来蓝图,不断进行试验,创建新的国家政权。自大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着法国哲学家们的著名著作是否直接导致了1789年革命事件的争辩,然而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哲学家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众多支持革命的人都认为这些著作是他们智慧的源泉,法国的历史总是通过复杂的方法与启蒙运动遗产联系在一起^{[7]295}。正是启蒙家们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原则助长了旧制度最后几十年在法国已经成长起来的公共舆论运动、政治论战文化和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而这正是法国人以理性、权利和正义的名义改造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来源所在。然而由革命的原则所激发起法兰西民众空前的革命狂热引发了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剧烈动荡,政治体制和革命政权的暴烈更替,特别是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的恐怖专政,传统、秩序、法制、自由、财产、安全等都被“人民主权”名义下的暴民统治(Mob-rule)无情践踏,留下更多的是腥风血雨清洗下的肉体伤害和精神创伤,法国事态的日益激进发展更显示了伯克作为思想家洞察力之深邃和作为政治家特有的敏锐以及预见的正确性,因此

以大革命爆发为契机,国内外引发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和对国家发展路径的重大论战是不可避免的。

(一) 与普赖斯博士的论战

1789年大革命爆发正是英国激进团体《革命协会》(Revolution Society)纪念“光荣革命”101周年,英国政治神学家普赖斯博士(Richard Price)发表著名的布道词《爱国论》(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认为大革命秉承了英国“光荣革命”精神,人民主权名义下创建新的政府,英国政府完全非法,应该通过另一场革命来推翻它,才是正当的。由此揭开了革命与传统、改良与革命激烈争辩的序幕。伯克的《法国革命论》议题之一就是谴责普赖斯的布道词,谴责其鼓吹法国革命,伯克不仅批评了英国人创建的激进团体《宪法协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和《革命协会》,而且从英国历史的传统资源中寻到依据,驳斥了普赖斯,即“光荣革命”并非是人民主权的胜利,而是源于古老的传统与先例。英国非国教牧师普赖斯博士在其《爱国论》中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看作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翻版。普赖斯提出了英国“光荣革命”原则下人民获得的所谓“三项基本权利”:“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府”。^{[6]21}伯克在书中驳斥了普赖斯博士所谓的“三项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依据王位继承法选择国王,统治者源自古老宪法,而非人民选举;自由来自对先人们的教诲的继承,宪政是对历史的继承,而非来自抽象原则,无需创建新的政府。相反伯克认为法国革命原则与1649年英国共和革命更相近,再远些可以追溯至1381年英国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的农民大起义^[9]。

伯克认为英国的宪政根植于约定俗成的权利,存在于古老的宪法性文件“大宪章”(Magna Carta)、“权力请愿书”(The petitions of Rights)中,深信英国人的自由乃是得自祖辈的一项遗产。对于这份丰厚的遗产,“我们已经小心翼翼地不去进行违反原来作物本性的任何幼芽接枝。我们迄今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是依据对于古代的尊崇这一原则进行的;而且我希望——不,我坚信不疑——今后所可能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根据类似的前例、权威和典范而小心翼翼地形成。”“我们的宪法就以这种办法在其它各部分之如此巨大的分歧性之中保持了一种统一性。我们有一个世袭的国王,一种世袭的贵族制,以及从一个漫长的祖先系列那里继承特权、公民权和自由权的下院和人民。”^{[6]41-44}伯克的所谓“法国革命威胁论”打破了18世纪以来英国相对平静的思

想界,一石激起千层浪。诸如很多小册子作家从不同侧面对《法国革命论》提出反驳,不到半年就有30种驳斥的文章问世^{[10]221}。

(二) 与托马斯·潘恩的论战

当《法国革命论》发表后,伯克的主要论战对手来自自己的好朋友,激进政治思想家和民主的斗士潘恩。这也是关于改良还是革命论争最激烈的,激烈的论争推动了英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想阵营的形成。这位国际主义者和自由的使者,因美国独立战争发表的《常识》(Common Sense)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为了驳斥伯克在他看来太不合时宜的言论,以3个月时间匆匆写完《人权论》(Rights of Man)第一篇《人的权利:对柏克攻击法国革命观点的一种应答》,1792年完成第二篇《人的权利:原则应用与实践》。《人权论》两篇是潘恩所倡导的“原则革命”的最成熟和系统的政治作品,关于《人的权利》的争论柏克对革命的批判和潘恩对革命原则的坚决捍卫展现的淋漓尽致。在论战中呈现了柏克关于法国革命与人的权利的基本论断,如对“光荣革命”原则的尊崇,英国宪法的光荣,法国革命的错误和不切实际,其暴虐和罪恶深重,先例和传统奠定了现有政府的合法性根基等,确立其基本的保守主义立场。而潘恩却将英国的传统和先例批评的体无完肤:英国没有成文宪法,而法国有成文宪法,光荣革命并不光荣,而是宫廷与贵族间的分赃协议,国王和议会不能代表英国人民,柏克混淆了个人与原则,法国革命的残暴源于政府的残暴,暴民随处可见,只有改良政府才能根治,论证分析《人权宣言》,证明法国革命完全符合人的权利原则和理性原则等^{[11]237}。

《人权论》第一篇是对柏克抨击法国革命的回应,如其英文版序言所言,“去年冬天柏克先生在英国议会发表反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国民议会的激烈言论时,我身在巴黎并曾事先写信告知他这里的事态发展如何的激动人心。当我看到柏克先生小册子中包含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误传以及这一小册子构成了对法国革命及其自由原则的蛮横的辱骂,从而造成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一种强加时,我的应答工作就显得更为必要。”^{[11]4}《人权论》保持了《常识》贯有的战斗风格,同样以犀利、嘲讽语言回敬柏克以粗野语言对法国革命的贬低,“在民族或个人之间挑拨与激怒彼此的诸多粗野言行中,柏克先生关于法国革命的小册子非比寻常。柏克先生同时在议会和公众面前发动一场针对法国的主动攻击,这种行为不能基于礼貌而被原谅。很少发现英语中的辱人之语未被柏克先生用在法国人民及其国民议会身上,

那些怨恨、偏见、无知或所谓的智识能够提示的一切都被倾注在不足四百页的篇幅之内。他失望、抑或满怀恶意的绝望,柏克先生曾经一度绝不相信法国会发生革命,现在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就只得通过痛加谴责来寻求退路。”^{[11]10} 针对伯克先生抨击法国人对君主的反叛,潘恩回击伯克是对法国革命根源的无知。“我们看到法国人反叛一位温和而合法的君主,其狂暴、愤怒和羞辱前所未闻,胜过反抗最不合法的篡夺者或最残暴的暴君的任何一种人民的行为。”潘恩则指出,法国革命不在于反对国王,而是反对这个令民族深恶痛绝的专制政府原则,这源自于许多世纪之前的原始建制,这些原则已变得根深蒂固,成为令人极其憎恶厌烦的、寄生者和掠夺者混处的奥球斯王牛廐,以至于必须通过一场完全而普遍的革命来加以移除和净化^{[11]17-18}。此外潘恩还抨击了伯克所尊崇的君主和贵族制度,高扬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革命思想。潘恩认为理性和无知影响了人类中的大多数,分别对应两种主要政府模式:一是基于选举和代表的政府;二是基于世袭继承的政府。他认为由于理性不同意世袭继承的政府形式,故只能建立在无知基础上,任何国家越无知,就越适合该种政府^{[11]101}。潘恩的《人权论》以民主、自由斗士之号召力引起广大英国社会下层民众共鸣,显然从深入人心而言,潘恩的小册子是震撼的,在宣传和回击上是成功的。

《人权论》大众化的政治语言风格,不仅通俗明了,而且文风犀利。譬如在对政府问题的理解上,伯克和潘恩两人态度截然不同,潘恩批评伯克在政府问题上对原则一无所知,“十年前,他说道,“我可以对法国拥有一个政府表示祝贺,无需探求该政府性质如何,或如何进行管理。”这是一位理性人士的话语吗?这是一颗如实面对人类之权利与幸福心灵的话语吗?按照此逻辑,柏克先生一定会恭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而在后者统治下饱受煎熬的受害人却被完全遗忘,不管他们是卖身为奴还是被折磨的无法生存^{[11]20}。《人权论》受英国社会下层广为欢迎,这对于当时英国社会已经出现的激进改革运动是一个极大的响应,在社会下层眼中被视为《圣经》,其影响堪比《法国革命论》,潘恩的《人权论》影响对19世纪上半叶英国议会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无疑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三) 与麦金托什的辩论

除了潘恩对伯克《法国革命论》的激烈回应,还有当时的苏格兰著名的法理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发表了《高卢辩》(Vindiciae Gallicae),其发表赢得了非国教派人士

及其辉格党中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人士的普遍赞誉,以致英国的革命派称赞为“促进了法国革命原则的传播”。直到20世纪麦金托什的《高卢辩》仍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对当时伯克思想做出的最为成功的答复^{[10]221}。伯克是站在“光荣革命”立场去攻击大革命,而普赖斯博士、潘恩、麦金托什也是以“光荣革命”为参照系,来看待这场与美国独立战争原则和革命精神一致的大革命,通过论战来夺取关于革命的话语权,以此捍卫各自的立场。在后者看来“光荣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百余年来已经趋向保守,特别是贵族垄断政权和选举,这种腐败的旧制度诸多弊端已经给英国带来严重问题,所以18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发起激进改革运动,工业革命中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为争取选举权而加入改革行列。再加上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王权开始趋向专制这一点伯克已经注意到了,因此在议会力争限制王权、改革时弊而回归“光荣革命”传统原则。但是法国革命原则在伯克看来是对“光荣革命”非暴力制度变迁传统的根本背离,绝不是普赖斯博士所言与“光荣革命”精神的一致性,因此关于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就是关乎国家根基的根本问题了,伯克的经验在于对英国政治文化智慧和传统的尊崇,对英国内战教训的记忆,所以他对“光荣革命”所奠定的立国原则是坚定不移的。

这场论战最终虽然以伯克的保守主义暂时占了上风,潘恩因《人权论》遭政府通缉而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保守主义也在论战中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受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和论战的影响,大革命后的整个欧洲基本趋向保守。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提出要领导一支拥护君主制度的十字军;俄国的老卡列琳娜禁止进一步翻译以前老朋友伏尔泰的著作,她称法国人为“卑鄙的流氓和吃人的畜生。”甚至是大洋彼岸的美国,杰弗逊被打上了雅各宾派和亲法派的烙印,而汉密尔顿则烙上了贵族派和亲英派的印痕^{[7]308}。可见大革命后关于“改良与革命”争论的意义是令人深思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看来,也正是在大革命的强烈冲击下,英国贵族精英为了避免革命发生,在内外压力下19世纪初开始启动改革长久以来为社会所诟病的“腐败的旧制度”,于1832年议会改革选举法案通过,工业资产阶级争得了议会选举权,英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和民主化进程向大众民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所以19世纪英国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加速,很难说与法国大革命原则没有关系,再者保守主义坚守的传统并非一概排斥变革,伯克就力主坚守传统下可适时进行变革。

伯克的《法国革命论》反映出来的思想过去和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保守的”，源于英国“光荣革命”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然而伯克却秉持了“光荣革命”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倡导秩序和代议分权的保守主义，是对自由的保守，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保守”。在伯克看来“旧的成见”值得珍爱，持续愈久，流传愈广，成见越发可贵。即使进行变革，也必须对传统有所保全；同样政治活动应该从现有的传统中来，现行的传统制度和机制都是好的，因为这些制度和机制凝聚了世代代积累下来的智慧。伯克特意列举了当时的传统制度：世袭的王室，代袭的贵族，下院，承袭了特权、选举权并拥有悠久自由传统的人民^{[4]7-10}。伯克早年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力主进行政治改革以及晚年政治态度走向保守，两者是并不矛盾的，在国家问题上，他始终是改良而不激进，保守而不顽固，既反对专制王权，又反对大众民主，主张维护宪制的均衡，在传统中变革，在变革中坚守传统。

三、现代语境下大革命之解剖

针对法国大革命后英国掀起的保守主义浪潮，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其《反动的语言》一书中勾勒了西方保守主义历史演变的主线，指出西方第一次反变革的保守主义浪潮是针对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带来的法律面前平等的公民权思想。他归纳了保守主义者致力于维护现状所持的三个论题：荒谬论题，无用论题，危险论题。伯克之所以攻击法国大革命，在于论谬论题，任何致力于改变现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政治活动都将导致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后果。所以伯克对大革命的观察和反思的核心和出发点在于他认识到，以革命方式追求自由绝不会像雅各宾主义者希望的那样扩大和维护自由，恰恰相反，革命将摧毁维持有限政治的必要条件，从而彻底葬送自由^{[4]6}。熟悉法国大革命进程的人都应该清楚，从攻陷巴士底狱到雅各宾派的倒台，在法国，一切权威、宗教、自然观、邻里关系、社会和国家制度等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传统理念、传统国家形式甚至是传统美德和生活方式都被当做是不合理的东西统统丢到垃圾堆里去了。对革命和暴力的崇拜，对理性女神的崇拜，对民主自由的狂热，特别是雅各宾党人对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实践，演变成直接民主制和主权名义下“多数人的专制与暴政”，上演了一幕幕革命惨剧，著名的吉伦特派政治家罗兰夫人在临刑前留下了令后世不得不冷静思考的冰冷呐喊：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

行。

19世纪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勒庞从革命心理学角度剖析了大革命时期法国民众的心态，对民主革命失败的病理分析是深刻的。他认为在那场旷日持久而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析古今自由之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在革命过程中，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是主要的，人民群众维持着传统的力量和连续性，在恐怖作用下，他们表现的极为驯服，然而当革命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得过头时，他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激发他们与之对抗，这时候他们就会寻求一位能够重建秩序的领袖^[12]。在现实中，一个民族或国家中的人们是无法割舍历史传统的，当革命者越是反对传统，则越是离不开传统，一旦暴力和情感在外界不断的刺激下，传统民族经历和记忆中对领袖强势人物的内心渴望会重新引发民众对专制集权的崇拜，恐怖时代雅各宾独裁专制的出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复杂作用的结果。作者通过心理学对法兰西民族性格和革命时代心理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的精神状态，他认为幻觉、经验对大众心理影响巨大，而理性则影响不到大众的心态和情绪，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13]。法国大革命与其说是启蒙理性的产物，不如说是非理性民族心理的宣泄。雅各宾派专制的崩溃，拿破仑帝国的建立，预示法国直接民主制理想和神话的彻底破灭，法国重新回归理性、法律和秩序之中，脱缰的“革命野马”重新得以规训。

结语

重读伯克，重新回到两百余年以前那个思想激荡的年代，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诸如自由与传统、保守与激进、民主与法治、传统与变革、权威与秩序等字眼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虽然伯克作为那个时代伟大的见证者，政治精英的典型代表，因其站在英国的历史与传统立场之上，对法国大革命超越时代的伟大意义却无法洞悉，有色眼镜下的观察和思考，使得其思想和言论明显带有认知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所留下来的诸多作品特别是《法国革命论》，闪烁着许多光辉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直至今日仍旧能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创建和国家治理进行对话，或许这就是伯克保守主义核心价值和魅力所在。如今我们所欣赏的是伯克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特质，马修·阿诺德在《论当今批评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这样评论：英国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让思想作用于

政治,让政治浸透着思想^[14]。著名学者何兆武老先生,也是《法国革命论》(1998年商务印书馆第一版)的译者,是较早将伯克保守主义思想引入国内的学者,也是较早关注伯克保守主义思想对当代社会的重大意义的学者。他在谈到伯克保守主义思想遗产时归结为两个问题。其一,作为人类历代智慧结晶的文化传统是最值得我们珍重的,文化是一场漫长而悠久的积累过程。没有前人的劳动创造,不认真学习前人的传统,我们就达不到今天的高度。传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权;一个政权可以推翻,但是传统却一定要保存,并且只有保存好了才能继续发扬光大,这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其二,人类的进步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凡是在改良行得通的地方,最否应该考虑尽可能地优先采用和平的方式而避免暴力的手段?这一点,在柏克的思想里面可能有着他对光荣革命的一种感情上的眷恋^[15]。

不可否认的是法国大革命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诸多普世价值理念以及民族意识、民族主义都对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大革命通过战争将革命理念传播至世界,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对殖民地独立运动、欧洲民族解放运动,乃至1917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无数的政治运动秉承了大革命遗产,法兰西革命在1789年以来的法国和世界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16]。拿破仑时代的亲历者,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显然较伯克更能深入揭示法国大革命的深层根源,他考察了18世纪法国哲学思想浓厚的反宗教性特征后认为“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形式、带有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17]托克维尔认为法兰西独特的民族性和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最终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过去为之辩护,未来加以谴责的革命”,是一场悲剧,它的悲剧性来自它本身提出的一个无法解答的道德问题,整场革命可以由它赖以产生的那些条件来辩护,即社会的严重不平等、王权的专横、贵族的残暴以及平民百姓的仇恨。大革命的教训在于只有同现行体制下的一切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同过去和现在的保守派作不懈的斗争,才能不断的改善社会,才能避免那种因权力滥用导致愤怒和暴力的怪圈,而继承大革命的遗产,恰恰意味着避免了持久的革命^[16]。

当然大革命的遗产继续影响着法兰西民族的历史进程,统治阶层与社会底层间的对抗依旧没有跳出大革命的范式,依然一次次上演了街垒对抗的大革命思维模式,最终法兰西人学会了英国模式的妥

协精神,巨大的内耗与战争失败的耻辱让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学会了妥协,社会大众也学会了妥协思维而渐渐放弃暴力思维,不再那么激进,从街垒对抗到议会民主是百余年来法兰西民族痛苦经历的反思的结果。20世纪初的中国之命运,也曾有过“改良与革命”激烈之争,最终中国仁人志士也秉承了大革命遗产,自辛亥革命以来,不断的革命与战争成为20世纪中国上半叶的主旋律,最终中国人在饱受战乱与动荡之苦后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在当代,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人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变革、改革与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候,尤其需要对理性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越来越看到200年前伯克思想中政治哲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伯克思想体系中自由主义理念与保守主义原则并行不悖,譬如自由和传统、激进与保守、民主和宪政、自由和财产权、改良与革命、多数民主与暴政、宽容与妥协等诸多问题。对那些具有忧国情怀和人文关怀、具有独立批判精神、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考察和洞悉了世界各国的民族历程之后,会深深感悟到: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缺少自我意识的大众盲目和非理性依旧充斥和侵蚀着我们社会有机体的健康成长,特别是激烈的政治盲动往往带来沉重的社会代价,而宽容、审慎与妥协思维则是当今中国深化改革、走向公平正义、通向民主宪政国家过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美德,而这一切都是伯克思想体系中至今最闪耀、最耐人寻味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 刘军宁. 保守的伯克 自由的伯克[J]. 读书, 1995, (3): 77.
- [2] 阎照祥. 英国政治思想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3] LEACH R. Political ideology in Britain[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54-58.
- [4] 罗杰·斯克拉顿. 保守主义的含义[M]. 王皖强,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 [5] 阿萨·勃利格斯. 英国社会史[M]. 陈叔平, 刘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188.
- [6] 柏克. 法国革命论[M]. 何兆武,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7] R·R·帕尔默. 现代世界史[M]. 董正华, 陈少衡, 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 [8] 钱乘旦, 陈晓律. 传统与变革——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181.

[9] CLAEYS G. The French Revolution debate in Brita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5-17.

[10] 张丽艳. 法国大革命论战语境[M]//陈恒, 耿相新. 新史学 (第九辑): 观念的历史.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11] 托马斯·潘恩. 人的权利——驳柏克并论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M]. 田飞龙,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

[12] 古斯塔夫勒庞. 革命心理学[M]. 佟得志, 刘训练,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12-13.

[13]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冯克利,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1.

[14]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 1780~1950[M]. 高晓玲, 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集团, 2011: 13.

[15] 何兆武. 评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两百年后的再思考[J]. 史学理论研究, 1994, (2): 80.

[16] 塞德里克·格里穆. 追踪1789——法国大革命[M]. 刘润恩,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7]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51.

British Outlook of Nation after Glorious Revolution from Edmund Burke's Conservative Thinking. ——Analyzing the Debates on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under French Revolution

CAO Rui-chen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China)

Abstract Edmund Burke was the pioneer of conservatism in the 18th century, especially as the turning point, the work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stirred the debates on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after outbreak of French Revolution, Edmund Burke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violence, blood and radicalism in French Revolution. He paid homage to tradition and order, and suggested mild reform, opposed the revolution. His thinking of conservatism played far-reaching impacts on Britai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onservatism. A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elites at that time, the ideals of conservatism of Edmund Burke showed that Britain founded a path of non-violence reformation step by step, and effected British conservative outlook of nation deeply. Edmund Burke's thinking displayed the intelligence of British o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till now, Edmund Burke's conservative thinking is helpful for managing the state affairs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 of traditions and reforms.

Key words Edmund Burke; conservatism; re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outlook of nation; debates

编辑 张莉